

间谍小说：一种通俗文类的兴起

萧 莎

内容提要 间谍小说是晚近形成的一种娱乐性较强的通俗文类。因其通俗，深入文本探索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价值的传统研究路径难有收获，关于间谍小说的学术批评一向被国内学界所忽视。本文选取英法学界的三位学者，山姆·古德曼、布莱特·F.伍兹和卢克·波尔坦斯基近年出版的三部重要著作，评析他们如何从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考察间谍小说兴起的语境，探讨间谍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类的独特性及文化价值，借此指出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 间谍小说 英国 地缘政治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扮演英国间谍007的演员丹尼尔·克雷格护卫，二人并肩出场，构成了颇有意味的一幕。奥运会既是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一个政治外交场合，也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进行自我表达、自我阐释的文化场合。英女王在此兼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她作为英国君主制的具象化身，是大不列颠国族身份的象征。^① 陪同她的詹姆斯·邦德，也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效忠于女王的臣民、公务员，其二是英国大众文化的代言人。

在此重大时刻，英国人选择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代表自己的文化形象，首先当然是基于文化市场影响力的考量。毕竟，根据伊恩·弗莱明小说原著改编的邦德系列电影，号称世界电影史上寿命最长的系列电影，同时，也是全球票房排名第三的系列电影。^② 可以断言，在英国以外的文化消费领域，知道邦德的人很可能多于知道莎士比亚的人。然而，从文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英国人的选择也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它体现了一种全民集体的自我认同：邦德是间谍小说所构建的一个符号，而孕育了邦德形象的间谍小说是一种兴起于英国的通俗文类；它在英国繁荣、光大，进而如种子般播撒至全球各个角落，在各国各地开花结果，英国人有理由引以为傲。

那么，问题就来了：间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兴起？它的繁荣兴盛是否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它作为一种通俗文类，特殊性何在？从现代社会的需

① Paul Ward, *Britishness since 187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4.

② 参见维基百科“James Bond”词条：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Bond

求来看, 间谍小说到底是否重要?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否具有某些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要回答上述疑问, 必须将小说文本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因为其一, 正如批评家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所指出的, 小说与它所生存于其中的总的文学形势和精神状况密切联系^①, 间谍小说作为大体上成形于20世纪初的新文类, 必定与整个世界的某些现当代特征相呼应; 其二, 间谍小说身上天生刻有不可磨灭、无法混淆的时间印记和环境烙印, 这也是它与探案、冒险、恐怖、奇幻等其他通俗文艺作品最显著的差别。探案、冒险等通俗文类是个人英雄的传奇, 虚化或虚拟时代背景基本不会削弱作品的可读性, 不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间谍文学则不然, 间谍小说的主角并非他自身, 而是具体国家的利益代言人, 他们的行动唯有放在特定语境下才有意义, 才可信。而真实度和可信度是间谍文学吸引力之关键要素。

值得高兴的是, 近年国际学界接连出版了几部重头著作, 不约而同地将间谍文学与英国乃至世界政治史、社会史并置观察, 将间谍小说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本文选取了三位学者的成果, 对此加以介绍和剖析。英国学者山姆·古德曼的《英国间谍小说与帝国的终结》(2015)^②和布莱特·F.伍兹的《中间地带: 间谍小说的政治史》(2008, 后简称《中间地带》)^③聚焦于间谍小说与地缘政治、历史观念之间的关系, 着重探讨间谍小说这一通俗文类的形成语境、发展路向和意识形态意义。法国学者卢克·波尔坦斯基则从间谍小说与侦探小说之相关和相似性出发, 研究二者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同构特征, 在《谜团与阴谋: 侦探小说、间谍小说与现代社会的形成》(2014, 后简称《谜团与阴谋》)^④一书中, 他将间谍小说之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意义分析得丝丝入扣。

间谍小说何以兴起

汉语中, “间谍”一词的“间”本义为门缝, 泛指缝隙。有了缝隙, 便可偷窥敌情, 故此, “间”便成了刺探和收集情报之专业人士的指称。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篇》把间谍分为“五间”, 解释道: “先知者, 不可取于鬼神,

①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 高原、董红钧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年, 第346页。

② Sam Goodman, *British Spy Fiction and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③ Brett F. Woods, *Neutral Groun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pionage Fiction*,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8.

④ Luc Boltanski, *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 Detective Stories, 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①意思是说，要想预先了解敌情，不能通过求神问鬼的方式获取，不能通过相似的事情类比推断，不能通过天象验证，必须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取得。这段话，可能是中国最早定义间谍职能的文献：间谍通过各种欺骗性手段征服敌方掌握信息的人，借以窥探情报；间谍职业反映的是政治军事领域不能承认、不可明说的灰暗面。

西方有关间谍活动的历史记载也不短。《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分别记载了摩西和约书亚依靠间谍渗透手段所建立的战功。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刻画了潜入希腊军队的特洛伊间谍多隆，《奥德赛》所歌唱的木马计背后隐藏着希腊间谍的身影。可见，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都意识到，间谍的专业素质对于战局输赢举足轻重，间谍作为一枚特殊棋子对于一国的政治前景十分重要。

间谍职业十分古老，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间谍才开始从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背景部分走出来，成为作家所专注刻画的正面主角。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的小说《间谍》（1821），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货郎身份作掩护、由美军总司令华盛顿亲自指挥的情报员哈维·柏奇的传奇经历，开创了间谍英雄的先河。不过，在19世纪小说中，光明正大描写间谍人员工作业绩的有影响的作品，也仅此一例。多数情况下间谍人物仅充当着其他类型小说中的配角，且往往是反角。最典型的例子是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短篇小说《布鲁斯-帕廷顿计划》。英国政府机关发生了一起海军潜艇研发机密失窃案，福尔摩斯发现是外国间谍收买内奸所为，最终破获了这起案件。间谍小说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是20世纪的事情。20世纪初，一大批间谍题材作品集中在英国面世，它们至今仍称得上经典谍战杰作：吉卜林的《基姆》（1901）、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沙洲之谜》（1903）、约瑟夫·康拉德的《间谍》（1907）、G.K. 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男人》（1907）等。

那么，间谍题材长期遭到文学创作者的漠视，原因是什么？

布莱特·F.伍兹在《中间地带》一书中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道德因素，二是社会原因。^②文学应当具有社会道德教化作用，这是西方自古希腊以降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学价值观。而间谍的事业存在于一个非道德的空间。他收买、欺诈、栽赃、暗杀，不择手段，目的是为了维护特定利益，不是服务于人类共同的精神理想。从道德教育的眼光看，选择一名间谍当主角比选一个小偷或杀人犯更糟糕，因为后者无法逃脱社会道德法则评判，而前者的工具性压倒一切，其生存首要法则即是无视善恶。不

① 孙武《孙子兵法》，郭化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09页。

② Brett F. Woods, *Neutral Groun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pionage Fiction*, p.8.

受社会道德法则裁断和制约的人，理应被驱逐到文学所表现和彰显的世界之外。

此外，隐秘的谍报活动对于西方民主政体也一向是某种尴尬的存在。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孕育出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后，民主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成为渐强音。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大陆被卷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风暴，西方世界启动亨廷顿所说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①到19世纪中期，民主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主潮。^②19世纪下半叶，民主成为如此重要、如此炙手可热的制度理想，以至于这一时期出版的比较政治史著作为了论证西方文明的先天优越性，鼓吹西方文明与民主制度之间天然存在亲和性，便堂而皇之将西方/文明/民主和东方/愚昧/反民主设定为二元对立的生物和文化基因进行话语建构了。^③

西方民主政治以公开、透明自诩，其政治话语就不能承认民主体制下也有阴谋诡计，可能藏污纳垢。它宣告，西方文明社会只有遵守政治法则的体面绅士，没有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和暗中交易。这种政治姿态，美国政治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后来总结为一句话：“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文明世界顺服政治伦理的束缚，容不下间谍的非法勾当，这在20世纪前是西方社会约定俗成的统一口径。因此，文学世界避开对间谍世界的正面审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间谍小说在20世纪初突破藩篱、喷涌而出，伍兹认为有三方面的推手在起作用。其一，地下情色文学在维多利亚时代泛滥数十年，它第一次将偷窥、不道德的人物关系及情节大规模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当时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扩大了人们的容忍度；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题材小说的出现，又对大众阅读市场产生了刺激。简言之，19世纪后期大众阅读市场的兴起和扩张，迫使文学世界重新审定自己的道德门槛；其二，19世纪末发生于巴黎的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坐实了间谍活动之于欧洲政坛的现实性。德雷福斯案件前后绵延十二年，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将法德之间互相安插间谍、法国人排查内奸、反犹派军官制造冤案的真实过程昭告天下。它对整个欧洲随后数十年的外交、政治格局和文化倾向，具有颠覆性影响；其三，世纪之交，大不列颠帝国正处于全球的霸权地位顶峰，帝国战线延伸过长、海内外潜在敌人之广，令英国人危机感强烈。此时，英国出版业之强大居欧洲之冠。伦敦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16.

② *Advances in Democrac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Day European Union (A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ed. Heather M. Campbell, New York: Rosen Education Service, 2011, p.71.

③ 此类比较政治史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托马斯·厄斯金·梅爵士的《欧洲民主史》(Thomas Erskine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A History*, New York: W. J. Widdleton, 1878)。

出版商对阅读市场的敏感与时势相结合，促成了英国间谍小说集群的诞生。

不过，间谍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其形成还有赖于一个重要的前导：19世纪兴起的侦探小说。卢克·波尔坦斯基在《谜团与阴谋》一书中指出，侦探小说首次将普通个人与国家体制（警察、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为叙述核心，从而首开先河地将文学作品所描摹的真实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在各自日常生活中所体验的个人真实，也即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所描述的事实，另一种是从国家体制视角出发、综合各方面信息得出的整体真实。整体真实的获取，必须仰赖于一系列行政法规、调查程序、专业知识和官方文件格式所构建的一整套制度框架。侦探小说吸引读者的悬念，本质上其实是通过建构整体真实，证明个人真实很可能是表面的假象，还有另一种真实存在。^①

波尔坦斯基认为，19世纪晚期的欧洲国家经历了两个重大变化：其一，国家各行政职能机构在国家威权下得到更有效更有力的整合与协调，实现现代化转型；其二，各种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兴起，为国家各部门和各级机构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可依赖的知识体系（*Mysteries*: 16）。这是侦探小说家笔下的警探得以构建全局真相的现实基础。而间谍小说在侦探小说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它关心的不仅仅是普通个人与一国体制之间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在间谍小说中，个人本位的真实要接受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宏大真实的检测和挑战；而且，最终，真实的决定权在民族—国家手中；个人行为是否具有意义，具有什么意义，由民族—国家说了算。

将间谍小说的上述结构特征与19世纪末的欧洲政治秩序相比照，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互呼应之处：一方面，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个人之于民族—国家的从属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强调；另一方面，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国家作为政治实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复杂，假若危机来临，位于神经末梢的个人几乎不可能理解和把握全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间谍小说也是应19世纪末的欧洲政治危机而生。

间谍小说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间谍小说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共生共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间谍小说的情节和主题变化无穷，但其生命力归根结底来自它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对历史现实的反映。为证明这一点，布莱特·F.伍兹在《中间地带》一书中细致梳理了间谍小说作为

^① Luc Boltanski, *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 Detective Stories, 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 pp.9-1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一种“英国原创”文类与英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百年互动，论述了小说文体与政治秩序的不同步演化。

间谍小说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阶段正好处于政治史学家们所称的英国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期。^①所谓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指的是英国统治阶级通过经济和文化宣传手段，诱使工人阶级加入拥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行列，造成英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拥有大众支持的局面。而事实上，英国在1873至1896年间遭受长达二十余年的经济大萧条，最终，殖民地财富回流，英国政府主导、英国军队支持的海外贷款及投资帮助经济形势解困回暖，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英国民众投向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在此形势下，英国间谍小说的主题集中关注英帝国的国际地位。例如：吉卜林的《基姆》以英俄“大博弈”为主线；奇尔德斯的《沙洲之谜》关注英德紧张关系；爱德华·奥本海姆的《历史制造者》聚焦于外国军国主义对英国统治的威胁；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专注描写潜伏在英国的外国间谍网。

其间，也有少数作品如康拉德的《间谍》、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男人》将视线切换回英国国内，选择当时在青年一代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思想倾向作为主题，但这一现实主义取向要到一战后、二战前才成为主流。

一战延续四年，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秩序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它给参战各国造成巨大创伤，即使是胜利方也不可能短时间康复。因此，渲染传奇式对抗和英雄主义的潮流退去，强调个人经历和感受、表现现实观察的作品应运而生。其中代表作有毛姆的《阿兴登》、埃里克·安布勒的《一个间谍的墓志铭》和格雷厄姆·格林的《忧虑重重的内阁》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人中，毛姆和格林都曾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安布勒则有军队一线工作经历，他们的文学想象更贴近现实也是不奇怪的。

对于英国来说，二战有两项任务，一是反抗法西斯主义霸权，二是防范苏联共产主义侵蚀。二战结束，法西斯主义被推翻，但随即冷战开始，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使命成为头号大事。二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度威名显赫的大英帝国被战争拖垮。1947年印度独立，马来西亚、肯尼亚、亚丁殖民地和苏伊士运河纷争四起，开启了英帝国衰朽的历史。此时，间谍小说不得不直面日不落帝国日落的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的小说家，取法于一战时期的老前辈约翰·巴肯，选择传奇化的写作道路：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正方主人公风流倜傥、智勇双全，注定要击败危害世界和平的敌人。另一方面，以连·戴顿、勒卡雷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对东

^① 政治学界一般认为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期是1880-1920年。参见*Neutral Groun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pionage Fiction*, p.25。

西柏林分裂的现实持更为暧昧的态度，他们笔下的人物更为复杂：他们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进行斗争的职责，但同时，富于道德意识和情感的另一个自我也在与工具化自我作着艰苦斗争。如果说弗莱明笔下的间谍是荣耀的、光彩熠熠的，那么戴顿和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则是孤独的、自我怀疑的、沉重的。

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英国间谍小说乘着文学译介和电影改编的翅膀跨过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多国由此得到启发，创作出属于各自民族的谍战小说作品。然而，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阵营之间大半个世纪的对抗忽然结束。敌人没了，间谍小说何去何从？新形势下，间谍小说创作只得回溯历史寻找资源。

在20世纪后期，一部分作家以二战留下的历史文献为基础，根据真实事件虚构故事，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作有杰克·希金斯的《猛鹰突击兵团》和肯·福莱特的《针眼》。还有一部分作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基于对历史文献的质疑，对其进行想象化改造，生产出一种揭秘内幕的“阴谋论”式作品。这一类别的代表作有弗里德里克·福赛斯的《敖德萨档案》和罗伯特·勒德拉姆的《启示录行动》。

间谍能当上英雄，根本上基于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提出的信念：任何对公众利益而言必须的服务都是光荣的。而18、19世纪欧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发，使“公众利益”通常可以置换成民族和国家利益。因此，间谍小说从出生起就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紧密。鉴于间谍小说勃兴正值英帝国主义高涨时期，作品主旨通常在于维护英帝国的优越地位、为英政府的强权加以辩护，因此，用波尔坦斯基的话说，间谍小说这一文类在成形之初毫无疑问站在保守甚至反动的立场上（*Mysteries*: 25）。

许多英国间谍小说家是帝国意识形态宣传家。例如，凭《三十九级台阶》闻名于世的约翰·巴肯，就把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的对抗定性为西方文明世界的价值观与野蛮人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自觉与英当权者保持一致的立场。吉卜林的小说《基姆》虽然从一名热爱东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视角表达了对被殖民地人民的钦佩和赞赏，并对英帝国统治者的傲慢、颟顸发出了辛辣的批评和讽刺，但作者最终还是让主人公与现实妥协，自豪地接受了服务于帝国霸权事业的职务和身份。

二战期间，埃里克·安布勒、海伦·麦金尼斯等人以反法西斯斗争为写作主题，表现出对间谍小说保守主义传统的超越。安布勒说，他希望改变间谍小说的局面，“将现有的秩序颠倒过来，让主人公从右翼变为左翼，成为受欢迎的先锋人物”^①。然而，二战结束，冷战给间谍小说带来一种全新的趣味：千方百计渲染间谍角色的个

① *Neutral Groun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pionage Fiction*, p.61.

人魅力和社交魅力，使之浪漫化和偶像化。其典型产物便是邦德式超级英雄。邦德是西方民主、也即普世的善的代言人，负责干预和扫平世界各国的危机；同时，他拥有全方位才能、自由意志、性吸引力，征服敌我双方美色无数。也就是说，绝对正确的帝国意识形态与个人最高价值集于邦德一身。这意味着讴歌帝国的曲调重新吹响。

古德曼曾在《卫报》上撰文指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护者邦德对于怀旧的英国大众是一贴重要的安慰剂：它引导大众直面冷战诱发的各种焦虑，缓和大众的恐惧，提供一种乐观暗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虽然在急剧收缩，帝国虽然在消失，但它比以往更安全，而且，英国在全球舞台上一如既往大有作为。^①

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间谍小说也不全是伊恩·弗莱明式的“代偿幻想”。连·戴顿和勒卡雷的小说读者群虽然没有邦德小说广泛，然而，它们对时代的认识和思考，显然要比邦德系列深刻。戴顿在《伊普克雷斯档案》中对谍报人员办公室生活的描述、对机关单位官僚气息的生动刻画，勒卡雷在斯麦利系列小说中对间谍事业之意义的探讨，对英国政权为维持余晖迫使个人作出无意义牺牲进行的批判——这些都体现出严肃小说的严肃特质。

戴顿和勒卡雷将视线从邦德所周游的国际大都会转回国内，体现出一种更为务实的意识形态立场：人们应该接受现实，英国的海外利益已经不再重要，关注国内的现实更有意义；最大的威胁不在外部，不是邦德所征服的一个个超级恶魔，它们很可能存在于英国内部，存在于可能是盟友的人群或机构中。

间谍小说：直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间谍小说是艺术模仿现实的产物。但它仅仅是作家们对英国现当代史或世界现当代史上的政治事件进行的想象性再现吗？显然不是。在波尔坦斯基看来，间谍小说还包含着向现实提问的新方法。这里所说的现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具有普遍性，那就是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天然存在的紧张关系。间谍小说的核心实则是对这一紧张关系的追问（*Mysteries*: 22）。

经典的间谍小说，归根结底讲述的是两个逻辑——领土逻辑和流动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土逻辑是民族—国家政权遵循的逻辑：国家边境包围着一块领土，领土上生活着国家政权有责任保护的的人民。而流动逻辑则是资本主义遵循的逻辑，也是民族—

^①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sep/05/spy-fiction-james-bond-why-spy-fiction-sells>

国家政权无力防备、无法抵抗的逻辑：在国家领土上存在许多自由流动的力量，它们很可能威胁到民族—国家政权的安全。

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存在的流动力量纷繁复杂。它们可能是在政治层面运作的代理人，例如听命于其他势力的间谍、政变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者等等；也可能是直接与资本主义运作挂钩的力量，如因故大批流动的人、商品流、银行掌控的金融流。银行和银行家十分特殊，他们虽然生存于特定民族—国家的领土上，可能拥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意本质上是不受边境限制的。早期的间谍小说反犹倾向特别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犹太人无国家。在早期间谍小说家眼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无国家归属，也就不具备神圣的忠诚理念，这是一个重大的生理及道德缺陷。由是，他们也就乐于安排有政治企图的阴谋家或银行家招募犹太人、将他们安插在敌人内部当卧底。

金钱通过货币兑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和传递，很容易隐匿其外国来源，隐藏来去踪迹。它对人的侵蚀腐化作用发生于无声无形中。金钱指使各种看不见的力量在领土上随意流动，看不见的力量持之以恒地努力改变领土的属性。而这一切，都很难在日常现实中现形。因为对于个人而言，一切都是个别的、零碎的表象，他既无法确定一个陌生人的真实身份，也无法知晓任意事件背后的真正格局。因此，间谍小说描述国家体制追寻整体真实，描写整体真实与个人真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直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现代民族—国家依赖资本运行，但资本也是对民族—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就这一层面而言，间谍小说的文化意义，不可小视。

间谍小说作为一种晚近形成的通俗文类，在普遍讲究体大思精的文学创作界地位不高，于是，顺理成章的，相关研究也一向被学界轻视。人们似乎觉得，间谍小说不过是供大众消遣的廉价消费品，文学性和思想性有限，有什么可深究的呢？本文讨论的三位学者，山姆·古德曼、卢克·波尔坦斯基和布莱特·F.伍兹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他们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优质的示范。可贵的不仅是他们对间谍小说何以产生、价值何在等具体问题做出的探究和回答，他们所尝试的研究方法——从文类整体的角度考据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